

一代学术大师王元化

陈 辽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但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新时期到来前,就很难列出学术大师的名字来。及至21世纪,我国学术界终于发现和认识到,新一代学术大师已经出现,王元化就是其中的杰出者。王元化在先秦诸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京剧研究、“五四”新文化研究、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关键词】学术大师;王元化

【中图分类号】G6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9)03-0001-06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但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新时期到来前,就很难列举出学术大师的名字来。新时期到来后,王元化的学术声名和学术地位蒸蒸日上,及至21世纪,我国学术界终于发现和认识到,新一代学术大师已经出现,他就是王元化。他不仅学贯古今中外,而且他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一、王元化对先秦诸子特别是对韩非子有新的发现

早在1962年,王元化就开始了先秦诸子的研究。他在《〈墨辨〉与〈荀子〉的认识分类》中认为,后期墨学的主要著作《墨辨》,其中把认识作用分为“知材”、“虑求”、“知接”、“恕明”四类,“已经初步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感觉、知觉、表象和抽象思维这几个不同阶段的认识功能。”荀子的认识论就是在前人基础上加以发展和改造而建立起来的。荀子提出了“缘天官”说,“更强调地指出人的认识活动是通过目、耳、口、鼻、形、体、心这几类器官来进行的。前五种属于感觉官能,心(应该说是大脑)代表思维活动的器官。”荀子在《正名篇》中曾充分地阐述了他的“缘天官”的认识论,“指明目、耳、口、鼻、形体所摄取的外物映象必须有待于心的微知才能构成认识的内容,而心的微知倘不

通过目、耳、口、鼻、形体簿物(去接触客观世界)就无法发挥它的综合与分析、区别同异的作用。”王元化对后期墨学《墨辨》和《荀子》“缘天官”说在我国认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的发微之言,前人不曾这样论述过。

1976年,当时全国都在“评法批儒”,把韩非子捧上了天。王元化却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独立写出了《韩非论稿》。他指出,“韩非所倡导的法是君主本位主义的法。他的法是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王元化不同意杨荣国《简明中国哲学史》用“摘句法”“对韩非作了不适当的掩饰和美化”,揭示“韩非的法是作为君人南面之术的一个环节”,“韩非自己也很清楚君主的统治是和人民完全对立的。”韩非从来不想考虑一下民心的向背,只是一味主张用势除患,以为只要采取高压政策就可以永保江山,“韩非那套法、术、势所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互相往来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王元化的《韩非论稿》是批判“四人帮”的“评法批儒”无限抬高法家韩非的荒谬做法的。“着重谈韩非学说中的‘术’,还不是对韩非的全面评价。”(王元化:《韩非论稿·附记》)在当年“四人帮”极度猖獗的日子里,王元化写成批判韩非的《韩非论稿》,而且把这部论稿给满涛、裘

[收稿日期] 2009-06-02

[作者简介] 陈辽(1931—),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柱常、李子云等几位同志看过,这不仅需要学术胆识,更需要理论勇气!新时期到来后,《韩非论稿》公开问世。学术界大吃一惊:原来在“四人帮”不可一世的年代里,还有王元化写作了这么一部批判韩非的学术著作!

二、王元化对《文心雕龙》有独到的探索

尽管王元化在1947年即已出版过《文艺漫谈》,1952年即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过评论集《向着真实》,但王元化之被公认为学术大师,却是因为他于1979年出版了学术巨著《文心雕龙创作论》。

1955年,王元化三十五岁,风华正茂,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被无辜打成“胡风骨干分子”,被开除党籍(他在1938年入党),行政降了6级。原任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的王元化,1960年被分配到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工作。他以六年时间悉心钻研《文心雕龙》这部古代经典文论。在收集材料和考证上,他下了很深的功夫,仅一个“神”字就作了厚厚一迭卡片。“后来收入书中作为附录的《心物交融说“物”字解》,就是由这种功力所收的成效的证据。”(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附录:作者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皇天不负苦心人,这部皇皇巨著终于在1966年“文革”前完成。但在“文革”中原稿被抄走,经过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原稿才回到王元化手中。1979年10月,该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好评如潮。

《文心雕龙创作论》何以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专著呢?

第一,在论述《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身世问题时,王元化提出刘属于庶族。而在此以前,《文心雕龙》研究者都称刘勰为士族。对于这一新说法,学者季羨林、周振甫、牟世金等多人都予以肯定,周振甫、牟世金后来都在各自的著作中采纳了此说。

第二,王元化考定《灭惑论》撰于梁时并由此划分刘勰的前后期思想,也得到了较多学者的首肯。如李庆甲、李森等均赞同此说,并作出了进一步的论证。

第三,王元化对《文心雕龙》中《特色篇》心物交融的解释,把《特色篇》定位为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的论述;对《神思篇》杼轴献功说的解

释,把它定位为关于艺术想象的论述;对《体性篇》才性说的解释,把它定位为关于风格,即作家的创作个性的论述;对《比兴篇》的拟容取心说的解释,把它定位为于意象,即表象与概念的综合的论述;对《情采篇》情志说的解释,把它定位为关于情志,即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的论述;对《熔裁篇》三准说的解释,把它定位为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的论述;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的解释,把它定位为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的论述;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的解释,把它定位为关于创作的直接性的论述,这些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因此,学术界,特别是《文心雕龙》研究界普遍认为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是继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以后的又一部研究《文心雕龙》的杰作。日本的《文心雕龙》研究者们也对王元化极其敬佩,几位日本学者将他们所撰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寄给王元化指正,后来,王元化将这些论文编选为《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并为之写了序言。

王元化在青年时期搞过创作,曾发表过小说《南行轮上》、《脚踪》、《舅爷爷》、《残缺的手记》、《花园》,散文《雨夜》、《献》,报告文学《出征》、《乞丐收容所》等多篇(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第一辑,以《脚踪》为题出版了这些作品)。对创作中的甘苦、形象思维的特点、想象的作用,他多有体会。因此,王元化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还结合着他自己的创作经验,这是该著作另一与众不同的特色。

三、王元化对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研究富有创意

王元化不只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和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成就非凡,而且对外国哲学、外国文论的研究也很有创意。

1955年至1960年,王元化因胡风案件受审查期间,他对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费尔巴哈等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做了研究。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先后精读过四遍,写了数十万言笔记。黑格尔著作的汉译本,他全部读过。他是把《小逻辑》和《哲学史讲演录》参照起来读的。王元化认为:“在黑格尔哲学、美学体系中,一方面体现了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由低级向高级,由萌芽状态向成熟状

态合规律的发展过程。”“这两个特点很值得我们在编写文学概论时,作为参考和借鉴。”^{[1]78}如此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是王元化精心钻研、深入思考黑格尔哲学的结果。对黑格尔的《美学》,王元化多次写过札记。他在札记中写道:尽管黑格尔本人这样宣布,美的法则先验地在自然美产生以前就已存在,但“事实上,这些美的法则正是从自然生命有机体的法则中概括出来的。离开了自然生命有机体又从哪里去寻找美的理念呢?”这就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美学中剥离出了它的合理的内核。“黑格尔《美学》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富的遗产,它的价值就是其中时时闪烁出来的辩证法的光芒。在辩证法的威力下,从知性出发的形而上学的各种观点都在根本上动摇起来,纷纷瓦解了。”^[2]有关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论著,在中国很多,但像王元化那样一语中的地提出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的精华所在,却是王元化的创意。

四、王元化对西方的莎士比亚研究进行比较研究,可谓中国第一人

王元化又是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他除了研究莎士比亚外,还着重对西方的莎士比亚研究进行比较研究。他对泰纳的《莎士比亚论》、威廉·席勒格的《莎士比亚研究》、赫兹列特的《莎士比亚戏剧人物论序》、兰姆的《关于莎士比亚悲剧上演问题》、史密斯的《莎士比亚评论集序》、歌德的《论哈姆雷特》、柯勒律治的《理查二世》、赫兹列特的《理查二世》等研究论文,不仅作了翻译(与夫人张可合作译,共五十万言),而且一一写了译文题记。他在题记中,对这些莎士比亚研究做了比较,他说:“关于英德两国在评论莎士比亚方面谁影响了谁的问题,应该认为是德国人领先的,因为歌德早在柯勒律治和席勒格之前就论述过《哈姆雷特》了,他是他俩的先驱者。”“就评论内容的深度来看,英国人也是远逊于德国人的。……在莎士比亚评论方面只有一个柯勒律治的某些片断尚有可观,这实在令人为之感叹。但事实是最顽强的,任何人的意志都无法改变它。”对于法国泰纳的莎士比亚研究,王元化作了平行比较:泰纳“在莎士比亚论中,他企图通过作品的分析,描绘出一幅作者的肖像,以显示作者的精神面貌。这种写评论的方法,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别具一格。”“在法国以反古典主义派的观点比较全面地来论述莎士比亚,毕竟还要算泰纳最早。”但是,“他在反对古典

主义派时所流露的直观主义,有其积极方面,也有其消极方面。”^[3]以影响比较、平行比较的方法,对西方的莎士比亚研究进行比较研究,王元化可谓中国第一人。

五、王元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说特别深刻

王元化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评价,既反对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反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挂钩;也不同意完全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它对于传统文化缺乏作全面的再认识再估价。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人所共知的。但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有人认为,“五四”全盘反传统;“文革”结束后,在西方的一些中国学者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左”的继续和泛滥,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挂起钩来。而在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时,又有不少学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肯定。王元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深入、彻底的思考,在《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载《传统与反传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中,首先批判了前一种观点,指出:“把五四精神和义和团精神以至造反精神一锅煮,是一种不分皂白的牵强说法。”“这些年来,随着新儒学和儒学第三期复兴的传播,国内也出现了和海外某些学者评价五四的类似论调。”在王元化看来,“五四精神在反儒家问题上是要出现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空气。如果不把儒家以外的诸子以及我国的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歌谣等等都摈斥于文化传统之外,那么就断断不能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五四启蒙者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如墨子、老庄、商鞅以至魏晋时代的人物和后来的李贽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即令对儒学五四启蒙者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王元化在发表这些意见时引述了充分的事实和论据,因而显得极有说服力。可以说,王元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民主性的最好、最有力的捍卫者。那么,王元化是不是全盘冒肯“五四”新文化运动呢?也不是。他说:“五四精神自然体现在反传统上。它反对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这是它的光辉所在,然而其病亦在是。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作全面的再认识再估价,经过批判使应该保存下来的保

存下来,吸收融化在新的思想体系中。五四启蒙者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殊少批判,就是对儒家本身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考,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分析了“五四”时期流行的庸俗进化论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四种观点,认为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潮的根源。王元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就其深刻性、彻底性而言,至今还不曾有人达到这一水平。

六、王元化对京剧文化的研究不同凡响

京剧被称为“国剧”,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京剧研究之作车载斗量,王元化的研究特别有份量。王元化自小受到京剧的熏陶,新时期到来后,他以很多精力研究京剧,写了《京剧与传统文化丛谈》、《论样板戏及其他》等多篇文章。他的京剧研究不同凡响,主要是因为他是从文化的层面上揭示京剧的文化内蕴所在的。王元化提出,文化构成有四要素:(一)不同文化类型在创造力上表现的特点。(二)它的心理素质。(三)它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和行为方式。(四)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文化构成四要素》,见《思辨短简》第2页)他对京剧的研究也就在这样的文化层面上展开。他对于京剧中所包含的文化意蕴、思想意境、道德观念、社会价值,作了精湛的评判。王元化喜欢余叔岩、杨宝森,因为余、杨“沉郁顿挫”。(《王元化与京戏》,《文汇报读书周报》2008年5月15日)他在《论样板戏及其他》中认为:“京剧的念做唱打,以及包括服饰、道具、布景等等的程式化,不是公式化,也不是象征化,而是一种具有民族艺术特点的写意型表演体系。”“中国艺术讲究含蓄,讲究意会,所谓意到笔不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等大量艺术格言,都是需要从写意这一特点才能理解,才能解释的。”如果说,现代中国作家真懂京剧的是老舍,那么,王元化便是老舍以后真懂京剧的大学者。

七、王元化对文艺现状和文艺理论现状有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判断

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王元化的文学评论集《向着真实》即在文学界颇受重视。新时期到来后,王元化广泛接触文艺界,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界的现状,更有具体、务实的了解。发而为文,他对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现状的评论,便高人一头,切中肯綮。鉴于多年来对“写真实”的无理批

判,王元化认为,新时期到来后文学创作要有突破,必须恢复和弘扬文学的真实性。他在1980年写作的《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一文中,不同意“所谓真实性强倾向性差的说法”,他以为“真正的倾向性不能游离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真实性之外,而是从艺术形象本身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针对有些人对“伤痕文学”的责难,说“伤痕文学”未能写出生活的本质,王元化又明确说明自己的观点:“现在有人以写本质去代替‘写真实’,我并不以为然。生活的本质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现象之外,也不是先验地产生于生活的现象之前,抽象的本质总是依附或潜在于具体的现象之中,赤裸裸的一无凭借的本质是没有的。”还有些人动不动以“社会效果”来否定那些写真实的作品,王元化也予以反驳:“社会效果归根到底仍离不开倾向性问题。”而“倾向性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认识、把握和表现生活真实时在艺术形象中的自然流露”;“自然,作家在写作时也要考虑到社会效果问题,但是,这种考虑首先必须尊重生活的真实,不能违反艺术的规律。只有在作家的思想感情适应并服从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情况下,他才能使自己关于社会效果的考虑步入正轨。”^[4]此后,中国文学界又出现了“反思文学”、“新的反封建文学”、“新的人的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极少再有人以“写本质”论、“社会效果”论来压制和反对这些“写真实”的文学了。

关于当时文艺理论的状况和存在问题,王元化在《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1982年,载《文学沉思录》)中更有他的独到之见。他反对“四人帮”实用主义猖獗,“对基础理论全盘否定”的做法,提出“要重视文艺基础理论的研究”,“打破过去的框架,善于吸取我们已有的文艺科学及其他有关科学理论的成果,创立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是当前文艺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任务。”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王元化认为,“不要把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无论在哲学、美学或文艺理论中只用一般和个别两个概念是不够的。许多问题只有用三范畴(个体性、特殊性、普遍性)才能阐释清楚,可是我们的理论很少运用后者,这不能不说是个缺陷。”譬如,“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不能因为运用纯抽象思维的表述方法,而没有多举实例,就批判它脱离实际。”王元化主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既要坚持又要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现在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是自然科学挑战”。自然科学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后,使自然科学各个领域都起了革命性的变化。“如果今天仍延用‘凡是’派的观点,用引证去代替论证,不重视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影响,不学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去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走进死胡同。”另一个挑战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挑战”。王元化对西方的“马克思学”持两点论。一方面,“应该承认我们对西方文艺钻研未深,对西方共产主义了解得还不够,通过研究,可以促使我们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发展到西方资产阶级‘马克思学’的某些岔道上去。”因为西方“马克思学”常常采用“把马克思学说加以歪曲,抽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使之变成西方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学说”;或者“采取杂交或渗透的办法使马克思学说与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现代哲学或社会学流派,如新精神分析学等混在一起”。“对这些我们必须研究,进行说理的论争,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当时,“三论”刚刚被引进中国,西方的“马克思学”才被介绍过来,王元化就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这两大挑战,提出了他的应战之道,这种理论上的先见又是文艺理论界不少人所缺乏的。王元化的《关于文艺理论的若干问题》实际上成了其后中国文艺理论界的一个旗帜鲜明的纲领,而为众多文艺理论工作者所贯彻和实践。

八、王元化提倡综合研究法,在治学方法方面开辟了一条新路

做学问,研究问题,都有一个治学方法问题。传统的有评注、疏讲的方法,直观的印象的方法,考证、训诂的方法,现代的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有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分析的方法与归纳的方法,有“三论”的方法,等等。王元化则提倡“综合研究法”。《〈综合研究法〉,《思辨短简》53—54页)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中对“综合研究法”作了具体说明:这就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我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后来分为独立的学科,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可说是一大进步,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往往由于分工过细,使各个有关学科彼此隔绝起来,形成

完全孤立的状态,从而和国外强调各种边缘科学的跨界研究的趋势恰成对照。”“至于把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的想法”,则“需要把古与今和中与外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对照,分辨同异,以便找出在文学发展上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说,王元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所有著述,都是以“综合研究法”撰著出来的。自然,采用“综合研究法”,必须学贯古今,博通中外,而且在文史哲方面都有很深厚的造诣才行。而王元化是完全具备这些条件的。就外文而言,他除了与张可合译过外国的莎士比亚评论文章外,还和他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961,中华书局出版)。他对英、法文都很精通。正因为具备这些条件,又在长期的治学实践中体会到“综合研究法”的意义和价值,他才倡导“综合研究法”。自从王元化提倡“综合研究法”以来,二十几年间,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试图运用或自觉采用这一治学方法,因而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就。

九、一代学术大师王元化是怎样炼成的?

王元化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并非偶然。

首先,他出生于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父亲是知名教授;他的母亲在当时也算相当新式的女性,能作诗词,常帮助丈夫润色中文函牍。在这样的家庭里,王元化自幼即受到了浓厚的文化气氛的熏染。青年时代,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热爱和敬佩鲁迅。他认为,现代中国没有其他作家和思想家能像鲁迅那样对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有如此透彻的洞察力,谁也不及鲁迅看得如此深刻。没有家庭的教养,没有鲁迅的深刻影响,就没有王元化后来的学术成就。

其次,他善于反思。抗日战争爆发,他身陷“孤岛”上海,1940年前后,他开始第一次反思。1955年以后,他在受审查时期,进行第二次反思。第三次反思的时间比较长,跨越了整个九十年代。王元化说:“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王元化:最后的访谈》,《文学报》2008年8月28日)王元化之所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和他的三次“反思”分不开。因为他的“反思”不是个人的苦思冥想,而是联系着他所处的时代,他的境遇;联系着古代中国的历史和现代中国的历史;联系着古今中外的学术;联系着各种各样的传统和思潮,而后把他的“反思”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王元化的

“反思”和他的做学问是互动的,相辅相成的。

再次,王元化之所以成为一代学术大师,又和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分不开的。如果中国还是像“文革”中那样闭关锁国,先进的自然科学不能引进过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合理的内核”不能介绍进来,也就没有王元化晚年的学术“井喷”,没有他在诸多学术领域里的熠熠光辉。一代学术大师王元化就是这样炼成的。

王元化逝世后,各种报刊发表了不少悼念和纪念文章,阐述了王元化的多方面成就。但是,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笔者认为,应该把一代学术大师王元化的所有著述当作一份宝贵的

文化遗产来加以继承、弘扬和发展,建设起我们新中国的现代学术流派,才算是对王元化的最好纪念。

【参考文献】

- [1] 王元化. 思辨短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2] 王元化. 读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札记[M]//清园论学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3] 王元化. 莎士比亚评论译文题记[M]//清园论学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4] 王元化. 对文学与真实的思考[M]//文学沉思录.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郭锡健】

Wang Yuanhua, A Great Academic Master

CHEN Liao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13,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rst half of 20th century, China witnessed emergence of many great scholars. Nevertheless,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there is a drain in great scholar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finally realizes that new generation academic masters have come into scene, and Wang Yuanhua is a distinguished one among them. Wang Yuanhua has made great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following studies: Pre-Qin scholars, *WenXinDiaoLong*, Peking Opera, "May 4th" New Culture, Hegel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s, Shakespeare, literary theory, etc.

Key words: academic master; Wang Yuanhua